

蔡昉

蔡昉论文选

理论界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蔡昉论文选

蔡 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昉论文选/蔡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6499-5

I. 蔡… II. 蔡…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702 号

-
- | | |
|-------|--|
| 书 名 | 蔡昉论文选 |
| 著 者 | 蔡 昉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王水涣 |
| 封面设计 | 惠 岩 |
| 版式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 $\frac{3}{4}$ 字数 332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499-5 |
| 定 价 | 50.00 元 |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作者简介 | 蔡 昉

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国外多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首批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著有《中国经济》、《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专著。



目 录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	1
发展阶段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演变	12
劳动力成本提高条件下如何保持竞争力？	24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41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52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68
“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	91
全球化怎样惠及普通劳动者	
——中国经济发展转折点上的政策选择	103
“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求及相关政策	122
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130
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	
——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142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159
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	174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192
论就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209
中国地区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220
区域差距、趋同与西部开发	250
人口转变新阶段与人力资本形成特点	265
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78

21 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人口和劳动力因素的作用 296

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

——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 315

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的中国经验 330

论“有保有压” 338

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

——事实回顾、经验分析与理论思考 347

重新思考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370

自然失业、周期失业与宏观政策选择 383

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

——再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391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各族人民对于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一五”规划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把十六大确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修订为人均 GDP 翻两番。按照这个更高要求,预计在 2020 年,中国以不变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就不是达到 3000 美元而是达到 4000 美元左右。仅仅从这个翻番目标来看,这个任务的完成并不是十分艰难的。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2040 美元。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以 1978 年至今的增长率趋势预测,人均 GDP 达到 4000 美元甚至远远发生在 2020 年之前,也就是说,如果在 2020 年达到这个翻番目标,只需保持一个比以往的速度更为平滑的增长趋势即可(参见图 1 中的两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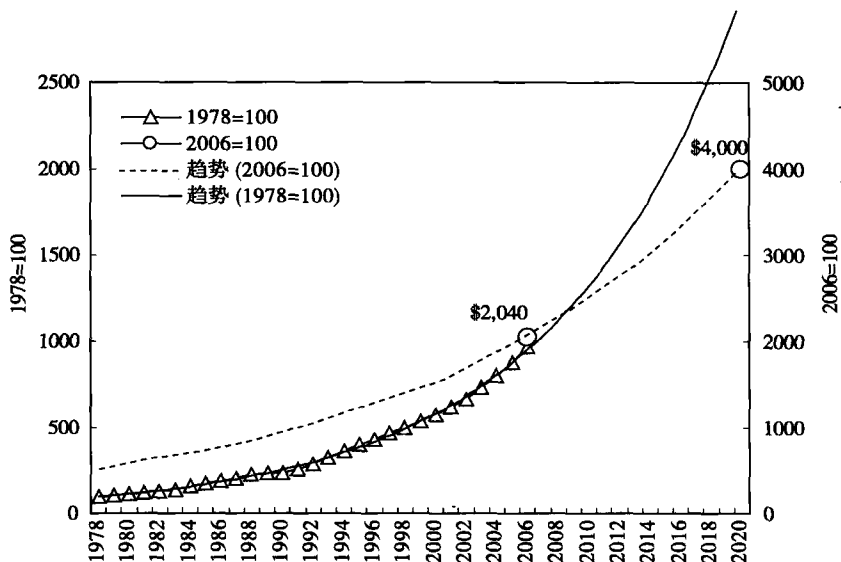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 GDP 翻两番的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按照十七大精神,人均 GDP 翻两番的任务同样要体现“又好又快”的要求,即这个人均收入水平目标的达到,应该以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为条件。换句话说,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是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这个目标出发,改善收入分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长期任务。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位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在其最新报告《东亚的复兴》中,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特别指出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Gill and Kharas,2007)。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的讨论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汗牛充栋,而相对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如何超越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还是比较新的课题。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与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形成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将从理论和政策的层面,讨论如何吸收国际发展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改善收入分配,超越正在面对的“低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深刻认识这个阶段面临的挑战何在、机遇何在,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定义,人均 GDP 在 824 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在 825 美元-3254 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在 3255 美元-10064 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超过 10065 美元,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从一个人均 GDP 只有 300 美元左右的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跃升到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

列。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定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观察世界各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跨越,继而向高收入的跨越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起步,对于随后的发展绩效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 1970 - 2003 年期间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 GDP 在 1000 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之后,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 GDP 在 1000 - 3000 美元之间的国家,30 余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处在典型的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向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也面临长期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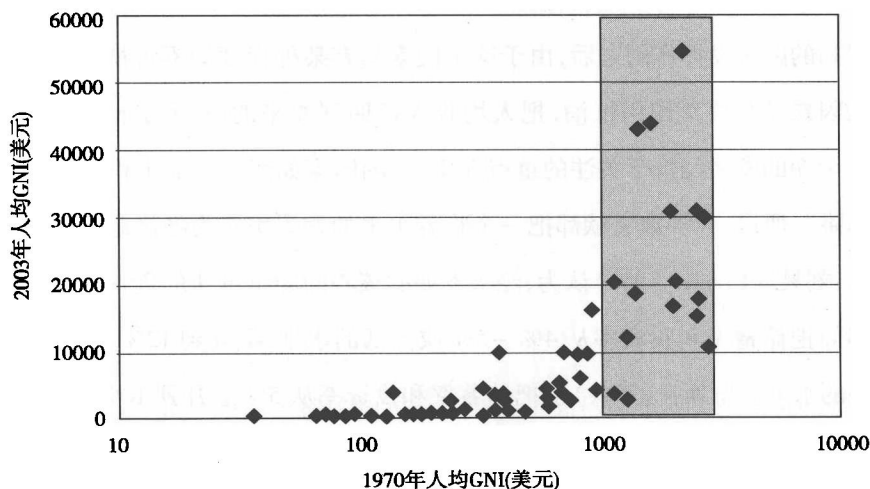


图 2 各国经济增长分化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注:横坐标是按照对数形式绘制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集。

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环境状况、改革与调整的进程、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等等。但许多因素的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也就是说,低中等收入实际上是一个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的时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激励,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在经济发展效果上表现为大分化。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平,而最不发达国家常常收入分配异常不公平。例如,目前位居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基尼系数分别为 0.25 和 0.32,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58,而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塞拉利昂,基尼系数高达 0.63 (World Bank, 2005)。

经济学中所谓收入陷阱,实际上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图 3)。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在于,贫困国家如何通过资本积累摆脱“贫困陷阱”,所以,大多数文献都把一个临界水平的积累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前提。例如,刘易斯(Lewis,1954)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或者说如何把储蓄率 and 投资率从 4% - 5% 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 12% - 15% 甚至更高的水平。罗斯托(2001)也把储蓄率 and 投资率从 5% 上升到 10% 或以上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条件。然而,如前所述的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Gill and Kharas,2007),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中起作用的因素,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不够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如果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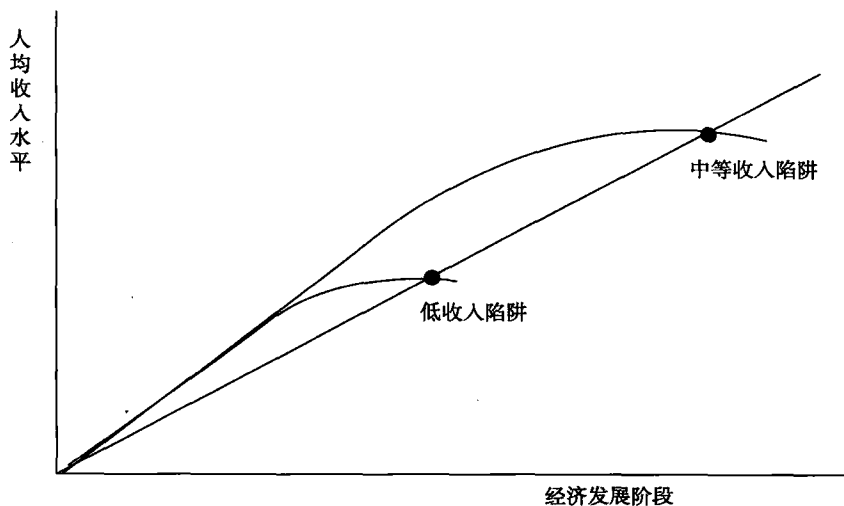


图3 低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只有0.30,属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期间,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表现为基尼系数逐年提高,1997年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水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基尼系数目前达到0.46左右。尽管这个收入差距是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增长的情况下扩大的,目前还没有到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程度。但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期间,实际上就是从低中等收入向高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关系到能否实现这个跨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三、扩大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

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论述,相比于十五大和十六大所提“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表述,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个新表述实际上指出,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是高度统一的,特别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两者决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加以认识和处理。

考察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可持续性,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统一的认识。收入的分配格局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模式。人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要素报酬,即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其他资源如土地的报酬。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采取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则资本获得的报酬就高,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拥有者集中,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如果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通过在城乡创造更多的普通就业岗位,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收入差距就比较小。

例如,作为各级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效果,大批下岗和失业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整体城镇就业大幅度增长,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逐年下降,从6.1%降低到2005年的5.2%。同期,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中,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并与最高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到2006年,前者增长率是12%,后者降低到10%以下。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不同收入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之间显现出明显的收敛,并且具有平稳加快的趋势。虽然这还不足以表明收入分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却说明就业扩大从而劳动者报酬份额提高,对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确是具有抑制作用的。

通过扩大就业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后,由于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会相应导致消费需求的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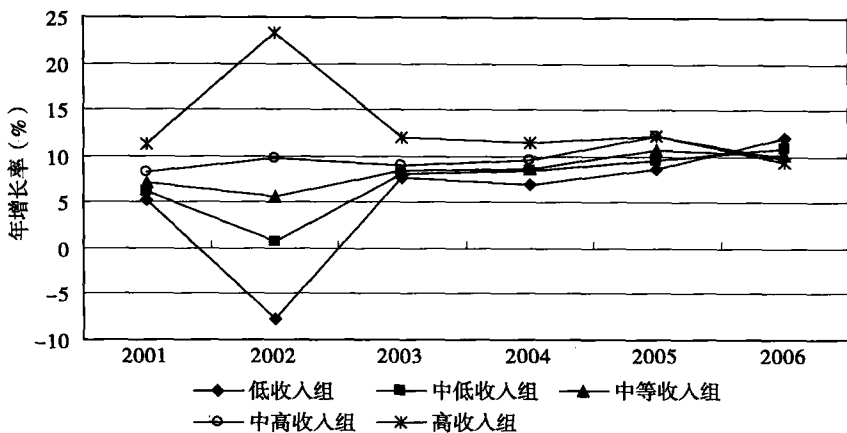


图4 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收敛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大。第一,对于投入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由于劳动力逐渐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终究要发生,因此,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上来,消费需求驱动的增长有利于实现这个转变。第二,过快过大的贸易顺差,无论怎样解释终究会在贸易伙伴一方引起贸易保护主义,长期看这种过分依赖贸易的格局也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下降,从 2000 年的 63.8% 降低到 2006 年的 38.9%,而 GDP 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同期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 21.7% 和 14.5% 提高到 40.7% 和 20.4%。其结果是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和顺差的扩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减弱。一旦消费需求对 GDP 增长的拉动效果增强,则可以改善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换句话说,通过扩大就业改善分配状况,可以同时改变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减少、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到来(蔡昉,2007)。这个转折点预示着一个符合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即市场力量和政策倾向逐渐转向

保护劳动者利益。首先,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充足和称职的劳动力所进行的竞争,可以推动劳动者得到接近合理的工资,工作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工人的利益较多地得到保障。其次,适应劳动力市场供求趋近于平衡的新情况,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日益自觉地实施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从而整体上形成一个越来越有利于下岗职工、失业者和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的市场氛围和政策环境。因此,这个时期恰好是加强劳动立法和执法、改善劳动关系、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的大好时机。但是,政府和社会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的同时,也应该防止伤害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从而导致市场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发生。毕竟,劳动力这个特殊的要素市场,仍然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其价格信号要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四、推动公平再分配的切入点

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一旦收入差距扩大到超过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人们会对政策失去信心,对改革产生不好的预期,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经济增长的进程就有可能被打乱,不公平就转化为没有效率。因此,政府为了矫正市场自发力量而进行的再分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将收入分配格局向合理有序的方向进行调节的有效手段。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Krugman,2006)。实际上,当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增长过程中大部分劳动群体的收入问题之后,社会再分配政策便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更加集中使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效果,解决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的问题。在这个再分配的领域,一方面同样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应该更加侧重公平原则的贯彻。

虽然在再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之间也不必然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

系,然而,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要把握和选择好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和限度的问题。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通过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制,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保护弱势群体。这种方式靠发挥政府职能,目标明确且直截了当,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问题。但是,再分配政策由于过多地依靠政府行为,带有抽肥补瘦的性质,如果运用不当,也存在着伤害合法、勤劳致富积极性的危险,另一方面还会导致一部分人群形成对再分配政策的依赖,创业和就业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该政策手段的运用需要恰当设计,把握好实施的力度和限度。任何社会都有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政府出面进行保护。为此,要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的扶助对象。把握住中国处在三个转型阶段,有助于我们认识需要作为再分配政策重点的人群。在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扶助对象和范围之后,需要通过更加准确的瞄准,集中资源扶助真正的困难群体,提高政策效率。

第一,再分配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中国所处的人口转变过程。在任何社会,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平衡共济,都是再分配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然而,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迅速的老龄化过程,使得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超过14%。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家庭人口结构逐渐变得类似于倒置的金字塔。除了养老保障问题之外,人口老龄化也导致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因此,再分配政策应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特殊需要,对于包括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因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而陷入困难的群体,进行专门救助。

第二,再分配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转型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些人群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也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目前,城镇享受最低社会保障的人群当中,40%以上是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冲